

# 文者，贯道之器也

朱康有

2021年12月14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、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引用“文者,贯道之器也”一语,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,把人生追求、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、民族命运、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,以文弘业、以文培元,以文立心、以文铸魂,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、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。

唐代李汉在为老师韩愈所写的《昌黎先生集序》中指出:“文者,贯道之器也;不深于斯道,有至焉者,不也。”李汉以“五经”进行佐证,指出文章是承载道的工具和手段;尊道而非浮饰的文章,才能成就传世经典。这是对韩愈文学思想的概括,乃中唐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。“安史之乱”以后,亟待恢复社会秩序,收拾人心,重整纲常。在这一背景下,韩愈发起古文运动,重视传承儒家道统,反对六朝至初唐文学忽视内容、单纯追求辞藻的绮靡文风。

文的原始意义当为一种带有强烈社会意义的身体修饰;其线条、图案作何种文饰,是由种族、成年、图腾等观念决定的。这使文的内涵从其发初之初就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政治伦理倾向。古人以文命名的事物,即包含着秩序井然、文采绚烂这样一种理想世界,同时具有社会的规范性与艺术的审美性双重内在的规定。周代社会以行为艺术化、规范化统一的“礼乐”著称,后世冠冕之以文称谓。中国最早一批典籍如“六经”之类,恰恰产生在周代这样一个文风浓郁的时期。孔子把它们称为“文献”,是既关乎伦理品格规范性又关乎艺术水准审美性的一种高度评定。如果说道这一词语由最早的“道路”进而引申出“规律”“方法”“秩序”的话,那么中国古代关于文的命名已经把这种象征规范性的道包含其中。文对道的这种内在要求,整体上影响和塑造了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论。

“文以贯道”是我国传统文人士大夫“文论”的最高标准。孔子关于“文质彬彬”的论述以及“志于道”的理想,较早地为儒家主导下的文论标准奠定了基石。先秦儒道把道看作客观事物规律,又把“圣贤”作为道的体现者,显现出制文以明道的理念。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指出:“道沿圣以垂文,圣因文而明道。”韩愈之后,北宋文学家周敦颐首次明确“文所以载道也”的主张。朱熹说:“道者文之根本,文者道之枝叶。惟其根本乎道,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。”程颐提出“作文害道”“为文亦玩物也”,这些话虽然说得重了一些,但无非仍在强调道的分量:我们不能理解为完全否定文的价值,否则就很难解释二程亦有文作传于后世了。

从哲学上看,载道之道不能单方面地解释为具体的“政治主张”或“政治举措”,毋宁说它是政治的根本、蓝图与灵魂,近于今人之“政治哲学”,且富有批判性的功能。它要求文学以自己的方式阐发与呈现道的真义,并没有否定“制文”“作文”甚至“能文”的必要性。韩愈曾说:“若圣人之道不用则已,用则必尚其能者。能者非他,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。有文字来,不则为文,然其存于今者,必其能者也。”韩愈评判创作的“能者”标准,其实就是同样要“重文”。他本人倡导“道统”的同时,在文体、文风、文学语言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。朱熹既有“言以明道”的主张,又有“文与道俱”的评判,强调文与道要始终相统一。20世纪初,新文学对“文以载道”观的批判,其实质是为了肃清传统文学里旧的思想,使之摆脱约束,真正地解放出来,载之于新道。

总之,“明”“贯”“载”含义虽略有不同,道的内涵与外延亦因时或人而有所改变,但大都表现出文道结合、以道为主的价值取向。新时代,文之“贯道”,集中体现为“弘业、培元、立心、铸魂”;以文弘业,弘的是中华民族复兴伟业;以文培元,培的是文化建设基础;以文立心,立的是一颗为民之心;以文铸魂,铸的是时代之魂。坚持“以文贯道”,把人生追求、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、民族命运、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,是造就文艺大师、铸就文艺高峰的根本途径。

(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)

# 推动义务教育迈向优质均衡

## 网言

从2022年起,除节假日和寒暑假外,周一至周五每天18时至21时,北京市所有初中学生都可享受免费在线辅导服务,辅导学科涵盖语文、数学、英语等9门。前段时间印发的《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(试行)》(以下简称《计划》),推出面向全市初中生的在线辅导管理服务平台,开放多种教学资源,提供多种形式的在线辅导服务,学生可按需选择适合的教师开展在线学习,引发广泛关注。

随着“双减”政策的出台实施,学生的负担普遍减轻了。不过,在此基础上,如何进一步丰富优质教育资源,更好满足学生的多样化、个性化学习需求,推动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,仍然是一个有待破解的课题。

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压力后,给予学有余力者更多深入探究的引导,给予相对薄弱者补缺补差的帮助,这样的个性化辅导,符合教育的本质属性,属于因材施教的实践。从这个角度看,为广大中学生配上由中学教师担任的“线上家教”,是在“双减”政策实施后,促进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个性化教育服务模式的

创新实践。

对于广大中学教师来说,这也是一个提升自身业务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的重要契机。根据《计划》,教师在线辅导工作量包括在线辅导时间、在线辅导绩效等部分。其中,在线辅导绩效要根据实际参与辅导学生的平均满意度、教师辅导实际完成质量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。教育部门还可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,对教师教学行为、辅导过程及其质量进行监测评估。这样的制度设计,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服务的同时,也打造了一个鼓励广大教师精益求精、大胆创新的平台。事实上,也只有抓住提升教师教学能力这个“牛鼻子”,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教育供给和教育均衡。

当然,想达到预期效果,还得防止开放型在线辅导演变为变相补课。首先,应尊重学生的选择自主性。比如,合理控制学生连续线上辅导时间,单次辅导时长不得超过30分钟等。其次,要明确在线辅导的定位,它是培养学生发展适应未来开放式学习环境的新型学习方式,确有需求时也要科学使用平台提供的服务。同时,教师也要协调好课堂主责与课外辅导之间的主次关系,不能因为参与在线辅导弱化的“线上家教”,是在“双减”政策实施后,促进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个性化教育服务模式的

(原载于《人民日报》 作者:赵婀娜 摘编:项锋、杨心悦)

#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

赵纪萍

## 光明论坛

中国新闻奖名专栏

评论版投稿邮箱 gmpinglun@163.com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要认真总结这次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,建立常态化、长效化制度机制,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,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,深刻阐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,充分肯定党史学习教育的显著成效和重大成果,对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出明确要求,为总结好、巩固好、拓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重要遵循。

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,需要科学指导,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。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史学习教育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,深刻阐明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价值和学习的根本目的、基本要求、科学态度,把我们对党的历史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,是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根本遵循。

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,要结合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》,深刻领会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价值和学习的根本目的,从党的“不懈奋斗史”“理论探索史”“自身建设史”中深刻感悟认识党的伟大贡献,系统掌握党创造的重大理论成果,

学习传承党铸就的伟大精神,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供不竭动力。

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,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要求,按照学史明理、学史增信、学史崇德、学史力行的要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,在党史中追溯理论发展、感悟信仰力量、发掘精神密码、提炼行动指南,在学思践悟中知行合一,用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启迪智慧、增强斗志。

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,要准确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科学态度,树立科学党史观,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,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,坚持客观地、全面地、发展地看待党的历史,发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,明确学习要求、学习任务,推进内容、形式、方法的创新,不断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,持之以恒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。

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,需要固本培元,不断加强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建设。党史研究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基础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,必须不断推动党史研究在内容、方法等方面不断开拓和创新,以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为党史研究的基础内容,不断夯实党史研究的学理基础,创新发展党史研究方法并拓展研究视角,以海量原始文献材料支撑党史研究,以大历史观把党史纳入古今中外历史研究的宽广时空范围,从长时段、全过程来透视和把握党史研究的历史价值和规律,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夯实学术根基。

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,必须加强和完善党史学科建设。科学的党史学科培养体系,是党史研究发展的基础。没有优秀的党史研究人才,党史学习教育的常态化长效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近日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《关于〈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〉及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的函》,提到新增中共党史党建为一级学科。这必将推动符合新时代发展特征的党史学科体系的加快构建,为加强党史研究夯实学科基础和人才基础,使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活水源源不断。

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,需要以史为鉴,从党的历次学习教育中总结经验、汲取智慧。一百年来,中国共产党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学习教育,每次都取得重要成果、发挥重要作用,并积累了丰富经验。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开展的这次党史学习教育,认真吸收借鉴历次学习教育的好做法好经验,立足新时代党史学习教育特点和党员、干部的实际需求,坚持守正创新,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学习方式、学习载体,取得了重要政治成果、思想成果、实践成果,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,对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具有重要借鉴启示意义,需要认真总结提炼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创造性运用。

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并强化政治统领,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深刻领会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,增强“四个意识”,坚定“四个自信”,做到“两个维护”,确保在政治立场、政治方向、政治原则、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,确保党

学习教育的正确政治方向。

二是坚持秉要执本,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把握党史的主题和主线、主流和本质,学懂弄通百年大党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等重大核心问题,在系统把握党史全貌的同时牢牢抓住党史学习教育的“根”和“魂”。

三是坚持高质量推动,在发掘学习教育内容、丰富学习教育载体、创新学习教育方式方法上下功夫,不断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力、影响力和辐射力。

四是坚持分类指导,进行受众细分,针对不同层级、不同部门、不同对象提出要求,发挥“关键少数”的引领示范作用,实现以上率下,形成联动效应。

五是坚持贯通历史与现实,牢牢把握办实事这个根本落脚点,把党史学习教育同观照现实、推动工作结合起来,始终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,努力把学习教育转化为工作成效,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、烦心事、揪心事,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。

(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、山东省委党校〔山东行政学院〕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)



更多内容请扫码关注“学习短评”专栏

#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正当时

胡颖康

## 光明时评

中国新闻奖名专栏

近期,深圳开始探索将宫颈癌疫苗纳入免疫规划,这款“一苗难求”的网红再次引发人们关注。而从2007年起,北京市就将流感疫苗纳入免疫规划,为部分人群免费接种。这些都不约而同地引出同一个公共政策议题:如何进一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?

预防接种和安全饮用水,是当今世界促进人类健康和降低死亡率的两大因素。诸多研究表明,免疫规划会带来数倍于成本的净回报。我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儿童计划免疫,历经2002年、2007年两次重大调整,目前形成“14苗防15病”的国家免疫规划体系,并且取得了传染病防控的巨大成就。近些年国家不断加大免疫规划投入,2020年超过40亿元,但依然有提升空间,如肺炎结合疫苗、轮状病毒疫苗尚未被纳入免疫规划。

疫苗未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,其直接后果就是接种率低,给健康公平带来挑战。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完成接种程序,肺炎结合疫苗需要2300多元,国产二价宫颈癌疫苗需要658元,轮状病毒疫苗需要1700多元。不同人群面对价格高昂的非免疫规划疫苗,其可及性差异巨大。有研究显示,财政统一支付模式下的意愿接种率为61.73%,而当全额个人支付时,这一数据降至1.68%。于是在现实中看到,越是落后地区,一些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就越大。我国轮状病毒胃肠炎导致的死亡病例有90%在农村,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也是农村高于城市。疾病风险增大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,是阻碍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。

免疫规划扩容,有财政投入的问题,也有激励和责任两大结构性原因。根据我国法律,不论是免疫规划还是疫苗市场,疫苗的直接提供方都是疾控机构。疫苗是给健康人使用的,有关部门在扩大免疫规划的决策过程中,需要考虑健康影响、公共财政承受力、社会公平等诸多因素。通俗地说,这事做对了能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,做错了会带来健康危害甚至会引起社会矛盾,因此必然充

满争议。长期以来,我国免疫规划疫苗价格总体上低于国际市场水平,公益性特征十分明显。低利润彰显企业社会责任,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改进质量和创新的动力。在非免疫规划市场,国内企业的研发策略以跟随跨国公司为主,容易形成产品同质化,往往是一个新品种有十几家企业在重复投资。由于每家企业的销售规模和盈利空间都有限,其优化工艺和扩大产能的动力不足,也没有能力开展大样本数据收集和循证研究,无法为扩大免疫规划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。当供给侧无法提供高质量、大规模、低成本的疫苗产品,作为需求侧的疾控机构若贸然扩大免疫规划,会面临很大的质量安全和可及性风险。因此,维持免疫规划范围成为理性选择。

如今我们迎来了好时机。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,正在事实上形成全人群免疫规划。各级党委政府直接部署和有力动员,超越了卫生部门单打独斗,探索出大规模人群场域下疫苗接种的有效途径。同样重要的是,当前民众已经形成接种疫苗保障健康的共识。具备了这样

的社会基础,我们有底气将更多的疫苗纳入免疫规划,从而大幅降低其带来的疾病负担。当前,国内一些疫苗企业提升了能力并积累了相当资金,应加大研发投入,升级换代免疫规划疫苗,并尽快实现高价疫苗的国产替代。疫苗企业还可以设立公益基金并捐赠疫苗,从而形成财政、医保、慈善相结合的免疫规划筹资体系。作为激励,监管部门应当对疫苗研发上市给予政策倾斜,提供更多审评技术支持。节省下来的财政经费可用于疫苗接种点设施建设,以及适当提高基层疾控人员和接种医护人员待遇。

(作者系中央党校〔国家行政学院〕社会生态部教授)



更多视频评论 请扫描二维码

# “高等教育女性全面反超”意味着什么

王丹

## 新闻随笔

近日,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(2011—2020)》终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示,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性别差距已基本消除,在包括研究生、普通本专科、成人本专科在内的各类高等教育中均出现性别比例逆转,即女性占比超过男性。

具体来看,高等教育在校生中,女研究生、女普通本专科、成人本专科的占比分别为50.9%、51%、58%,这个比例在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间,分别提升了3.1%、0.1%和4.9%。单纯从数字来看,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优势地位似乎并不显著,但如果考虑到中国一直失衡的出生性别比,或在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适当“高估”女性的教育优势。

在当前性别议题广受关注的社会语境下,“高等教育女性全面反超”被视作中国推进性别平等的一大成就。从宏观层面来说,女性教育优势的显现和累积是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相伴的,尤其是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和高等教育的扩招,大大增加了女性可获得的教育资源和机会。国家对偏远和农村地区的政策倾斜与助学网络的编织,也增加了女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。而从微观层面来说,激烈的就业竞争叠加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,以获得预期的教育投资回报。

女性教育优势意味着什么?在一些人看来,也许是更高的学历、求职时的竞争力,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更为体面的生活、值得期待的发展前景。对那些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来说,各教育阶段女性占比数字的任何一点提高,背后可能是一个个被改写的人生故事。此外,更多受教育尤其是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出现,还将在更大的私人 and 公共领域带来改变。值得一提的是,女性的教育优势并不一定能换来就业市场的竞争力。事实上,随着更多受教育尤其是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进入就业市场,迎接她们的是更为激烈的竞争。在过往的新闻中,不时爆出用人单位明显偏好男性的招聘政策,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女性教育优势带来的冲击。隐藏在各地的性别歧视以及不平等的职场权力关系,已经让女性承压不小,步入婚育阶段,女性还不得不接受职业发展落后于男性甚至退出职场的后果。发生在教育场域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这个转折,不能不引起关注。这不仅是因为,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这部分被

暂时抑制或浪费的人力资源来支撑,而且学者参照其他国家发展模型预测,未来多年内,中国女性的教育优势将进一步累积,由此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矛盾及冲击也将更大,有必要未雨绸缪,作出合时宜的制度引导和安排。

面对越来越多高知识女性进入就业领域的趋势,我们要有加快生育成本社会化共担机制探索的紧迫感。对于用人单位来说,用工成本的不可预期,有助于推动就业中性别歧视的消除。这对就业女性来说,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延长职业生涯,提高职业贡献度。因应变化调整工作者评价体系,探索实行弹性工作制等更为细致而繁杂的工作,也都应该提上日程。如此,女性的教育优势才能真正沉淀为促进女性自身发展的机会与资源,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平等和谐、富有活力。